

职业指导与民国时期乡村救济改良

金 兵¹ 王卫平²

(1.浙江工商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2.苏州大学 社会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摘要】民国时期科学意义上的职业指导从西方被介绍到中国。20 世纪 20 年代以后,受一些专家、组织的推动,职业指导也介入到乡村的救济改良中,试图通过培养青年服务农村意识、改良乡村传统职业观念、开拓乡村择业视野、激发乡村创业热情等,与其它救济改良措施配合,来解决乡村问题、推动农村复兴。民国时期职业指导在乡村救济改良方面虽然只是一种尝试,但从长远来看,对乡村社会发展仍有着特殊的意义。

【关键词】职业指导;乡村;改良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19)01-0129-09

Vocational Guidance and Its Effect on the Improvement of Rural Relief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JING Bing¹ WANG Wei-ping²

(1.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2.School of Society, Soochow University, Soochow 215123)

Abstract: The vocational guidance in the scientific sense was introduced to China from the West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fter 1920s, some experts and organizations practiced vocational guidance in the rural area of China. They wanted to use vocational guidance to cultivate youth's awareness of serving rural area, change the rural people's traditional vocational concept, broaden the vision of choose vocation in rural area, and stimulate the enthusiasm of Entrepreneurship in rural area. They wanted to use vocational guidance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Chinese rural area and revive the rural society together with other reform measures. Although it was just an attempt that the vocational guidance was practiced in rural area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vocational guidance was a special signific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rural area in the long term.

Key Words: vocational guidance; rural area; improvement

乡村建设是民国时期重要的社会思潮。民国时期出现过许多乡村建设方案,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对中国农村进行救济改良。职业指导即为其中之一。20 世纪 20 年代以后,一部分专家和组织试图从职业问题入手,介入乡村的救济改良,通过培养青年服务乡村意识、转变乡村陈旧职业观念、开阔乡村择业视野、激发乡村创业热情等,与其它救济改良措施配合,以解决农村问题、推动农村发展。民国时

【收稿日期】2018-11-12

【项目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国时期归国留学生与职业指导事业研究”(17BZS075)

【作者简介】金兵(1976—),男,历史学博士,现为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近现代史教研部副教授,香港城市大学访问学者,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王卫平(1962—),男,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主要研究中国社会史。

期职业指导对乡村救济改良的介入,较长时间内未得到学界的足够关注^①。研究民国时期职业指导对乡村救济改良的介入,不仅可以丰富人们对当时乡村救济改良活动的认识,还可以以个案的形式,对乡村救济改良方案的产生背景、认识视角、问题指向及价值判断等问题的探讨提供帮助。

一、乡村改良救济背景下农村职业指导的提倡

民国时期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如何,学界仍有不同的见解。尽管当代也有学者认为民国农村有过某种程度的发展,但对于民国时期社会精英来说,却大多对当时中国农村社会的整体状况持一种失望态度。后一种认识,在民国时期比比皆是。这是民国时期乡村改良救济运动产生的重要背景,也是后来职业指导介入乡村救济改良的主要推动因素。

民国时期许多知名人士在论及当时中国农村状况时,几乎一边倒地持失望和担忧的态度。尤其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世界性经济大危机的冲击下,这种失望担忧情绪更加明显。20世纪30年代,穆藕初与杜月笙、王一亭、顾馨一等社会闻人在《申报》上联名发表的文章称,“然以农村破产,灾害沍至,复加国外粮食之竞争,杂粮商之困苦,更有岌岌可危终日之势。”^②著名学者胡适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其最大负担都压在那百分之九十几的贫苦农民身上。人民吃不起盐了,穷到刨削地土上的硝盐,又还要犯罪受罚!”^③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的宋子文在一次公开讲话中也承认:“以我国现在经济而言,农村破产,商业凋敝。”^④民国时期一些知名的文学及电影作品,也反映过当时农村的衰败,如茅盾《农村三部曲》小说之《春蚕》《秋收》《残冬》,再如蔡楚生执导的电影《渔光曲》等。所以当代有学者指出:“尽管在目前中国近代农村经济史研究中,海内外不同学者对于民国时期的农业经济的判定仍有很大的差距,亦不乏较为肯定的评估。这是经济史研究中数量统计的科学式‘后见之明’,但在当时的舆论环境中,时人几乎均认同中国农村‘衰败’或‘崩溃’的残酷现实,几乎无人对农村经济做出过乐观的评述。”^⑤其实,民国时期有些学者对当时农村社会发展状况的判断是建立在实地调研基础上的。薛暮桥在1932年无锡西北乡小镇礼社的调查中指出,“年来丝业衰落,茧收荒歉,客商裹足不前,都市工商业资本在农村并无显著发展”,“农民贫困之结果,使耕作技术愈趋粗率。年来农业非惟毫无改进,且有江河日下之势。”^⑥费孝通在他著名的《乡村经济》一书中,对太湖沿岸的开弦弓村调研之后,也指出“在这个村里,当前经济萧条的直接原因是家庭手工业的衰落”,“这个村庄同中国绝大多数的其他村子一样,具有共同的过程”;“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⑦

① 当代国内学界关于民国时期乡村建设比较重要的成果有朱汉国的《梁漱溟乡村建设研究》(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郑大华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宋恩荣和熊贤君的《晏阳初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王安平的《卢作孚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述论》(《社会科学研究》1997年第5期),等等。但目前学界对于民国时期职业指导在乡村建设中的探索,却缺乏专门的关注和探讨。

② 穆家修、柳和城、穆伟杰编著:《穆藕初年谱长编》(下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036页。

③ 胡适:《新年的梦想》(《大公报》1935年1月6日“星期论文”),《胡适全集》第2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40页。

④ 《出席华府会议代表宋子文今午赴美》,《申报》1933年4月18日第7版。

⑤ 蒋宝麟:《体国经世:民国的学人与商人》,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第24-25页。

⑥ 薛暮桥:《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索引》(原载于《新创造》第2卷第1、2期,1932年7月22日),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3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年,第164、165页。

⑦ 费孝通:《江村经济》(修订本),世纪出版集团,2013年,第211页。

认识决定行动。笔者认为,民国时期中国农村救济与改良活动之所以会在各地出现,与当时社会精英对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认知和评价有很大关系。时人对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评估,决定着他们采取的行动。对当时中国乡村状况的认识评价及其不同的归因,推动了平民教育、乡村建设等派别的出现,推动了解决中国农村问题各种主张的出现。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是基于“近年农产输出锐减,同时倒有大量农产入口,中国农业继手工业而破坏,影响百业”这样的认识^①。晏阳初也是基于“为什么有四千年历史的国家,农村破产到这地步”这样的认识,才“自己住到乡村里去做平民教育的研究实验。”^②20世纪20年代末以后,提倡面向乡村开展职业指导,也是受类似的社会思潮推动。

民国初年,职业指导被一些归国留学生及翻译人员从西方国家介绍到中国。科学意义上的职业指导运用近代心理学、生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知识,旨在通过咨询、教导的方式,为人们提供择业、就业、适业、改业等方面的服务。较早在国内有组织开展职业指导活动的,是有着留美预备学校特征的北京清华学校。1916年清华学校校长周诒春开始邀请专家学者向毕业生作选科择业的演讲,帮助他们规划未来的职业方向。此后,南京的东南大学附属中学、昆山县立初级中学等校也相继在校内开展不同形式的职业指导活动。20世纪20年代中期,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上海、南京、济南、武汉举办过“一星期职业指导运动”。1927年上海基督教青年会设立职业指导部,而中华职业教育社则创办了上海职业指导所。这是中国最早出现的两家面向社会服务的职业指导机构。后来在南京、无锡、吴县、广州、厦门等城市,也出现了职业指导所的组织。民国时期无论是学校中面向学生开展的职业指导,还是社会上职业指导所提供的公共职业指导服务,一段时间内均囿于城市。城市里的职业指导至少在理论上和某些个案上是成功的。这种成功也刺激了部分人士将其运用于乡村的野心。

在此背景下,一些有识之士如潘文安、古棣、金鼎一、蓝渭滨、陈礼江等人呼吁在乡村开展职业指导。早年留学美国,回国后担任过江苏教育学院教务长、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的陈礼江指出:“在我国学校,尤其乡村小学,对于儿童的职业指导,毫不注意。乡村小学儿童毕业后就业者,往往因袭父母之职业,升学者则任其摸索,无论就业、升学,是否合乎他们的个性,绝无人过问。这真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③学者古棣指出:“乡村人民生计之困难,前已反复言之,……吾人认为解决生计之法,首赖教育,使乡村人民之知能增加,然后生产自能丰足,生计问题自可随之解决。而教育之设施,尤当从小学始。盖小学教育之目的,虽非专为职业知能之训练,然其基本知能则不可不于此培植之;注重职业陶冶与职业指导者,即为此耳。”^④长期从事乡村师范教育的金鼎一认为,“职业指导,是现今农村小学最切需要厉行施行的事体”,如果不在农村施行职业指导,那么年轻人“因羡慕都市的繁荣,势必一天一天的奔往都市里去,那农村就更日形空虚和衰落”;“因农村经济破产,生活的压迫,已趋于无业的游民,也将继着小偷盗贼而起。”^⑤曾任中国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执行委员、常务委员的蓝渭滨认为,“当此农村经济破产之秋,农村经济事业之设施,更加重要”^⑥。他认为农村经济事业之设施“应举办者”首推职业指导,“农村保护教育之最重要者是少年职业指导,农民关于经济情形不明时代之需要,对于选择职业,每发生困难,且欲明了儿童之性能及发现其通于何种职业,乃是专门事项。故此,关于少年择业应予以切实指导,况且少年择业指导,都市已有设立,农村如不普设,则农村少年之就职业决比都市少年落后,故农村少年职业指导实在重要”,“故对于农民,应有职业指导之设施,广启发其择业之精神及

①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00页。

② 晏阳初:《三桩基本建设》,宋恩荣主编《晏阳初全集》第2卷,天津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16页。

③ 陈礼江编著:《简易师范学校乡村教育及民众教育》(建国教科书),正中书局(重庆),1938年,第74页。

④ 古棣:《乡村教育新论》(全1册),民智书局(上海),1930年,第170-171页。

⑤ 金鼎一:《农村小学的职业指导》,《农村》1934年第1卷第11期,1934年9月。

⑥ 蓝渭滨:《农村社会事业之理论与实施》,农村经济月刊社编《农民阵线》编者刊,1934年。

指导其择业之途径,方不致养成无业游民与徒劳无功。”^① 职业指导专家、上海职业指导所副主任潘文安也指出,“中国几千年以来,是以农立国的。但是到了现在,外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内受天灾兵事的损失,加以农民不自振作,弄得生产不够自给,——棉布、米、麦、也要外人供给,——这是多么危险的事啊!”^② 他呼吁中国农村应该提倡职业指导,以“指导农民及子弟,其努力于其最有兴趣最愿从事的事业,以增进农村的经济。”^③

前面这些提倡农村职业指导的人,既有原来的城市职业指导专家,也有一些其他领域的社会人士;既有教育学者,也有国民党党务人员,也有亦官亦学式的人物。尽管他们的身份背景不同,但有着一些共同特征,那就是对当时乡村状况持失望态度,认为有些问题出在农民的职业观念上,主张把职业指导作为农村救济改良的一种手段。

二、职业指导面向乡村的尝试与探索

民国时期较早惠及乡村的职业指导,源于城市里社会职业指导机构提供的通信指导服务。以上海职业指导所为例,该所成立后不久,为扩大指导范围、免除求助者来回奔波之苦,推出了通信指导服务。该所规定,只要来信请求指导,在信件中“附寄复信邮票”,就可以得到指导的回复^④。这样一种通信指导服务,使一部分农村青年也得到了职业指导的帮助。以下是上海职业指导所副主任潘文安记录的一个农村青年以通信方式求助并得到职业指导的实例。这位农村青年的求助信内容如下:

指导先生:

我是困于经济而停学的一个人,最近已到山穷水尽再无法维持的生活了。兹特请先生示一可靠之函授职业学校,能于毕业后有介绍职业之希望,庶不致为营业式者所欺骗,并请先生等以经验所得之关于学生谋生之法门和捷径,细示一二,尤为感激!

邱鉴湖^⑤

上海职业指导所在答复中向这位农村青年指出:“职业学校以实习为原则,函授学校,决不可靠,并且这种学校,无非抱着营业主义,敝所万不愿为你介绍;至于求职业之途,全要脚踏实地,不应有希冀厚利或捷径的侥幸心,同人之意,足下如有志经营职业尽可在乡间努力做去,如养鸡、养鸭、养蜂、饲蚕、种桑、种果蔬等,都是独立自营的职业,自由自在,不受人家拘束,何必群趋都市。”^⑥ 并且,上海职业指导所虽为城市里的职业指导机构,也乐于为乡村建设提供帮助。上海职业指导所副主任潘文安曾接受上海附近的华亭乡邀请,参加该地武村改进社成立暨民众夜校开学典礼,在典礼上的演讲中指出:“民众除正当职业外,应有副业的重要性”^⑦,对乡民进行职业指导。在上海职业指导所的示范下,其他一些地方职业指导所开展的服务也曾兼顾农村地区。

稍后,部分位于农村地区的中小学或农林类职业学校也开展了对学生的职业指导,以便学生将来能够就业乡村、服务乡村。私立福州协和中学位于福州郊区,是一所教会办的学校,设有农林科、师范

① 蓝渭滨:《农村社会事业之理论与实施》,农村经济月刊社编《农民阵线》,编者刊 1934 年。

② 潘文安:《职业指导 ABC》,ABC 丛书社(上海),1931 年,第 55 页。

③ 潘文安:《职业指导 ABC》,ABC 丛书社(上海),1931 年,第 57 页。

④ 《上海职业指导所简则》,《教育与职业》总第 89 期,1927 年 10 月。

⑤ 潘文安:《职业指导之实验》,《教育与职业》总第 92 期,1928 年 2 月。

⑥ 潘文安:《职业指导之实验》,《教育与职业》总第 92 期,1928 年 2 月。

⑦ 《华亭乡志》编纂委员会编:《华亭乡志》,学林出版社,2013 年,第 389 页。

科、初中部及附属小学等。鉴于学生多贫寒子弟,“师范科学生,毕业以后,多在各外县乡村小学服务”,“农林科毕业生回到农村,也有改任小学教职的”情况,该校积极对学生进行职业指导,让“农林科学生应兼读乡村教育实用的科目;而师范科学生也应兼读基本的实用的农林学科。”^①私立福州协和中学“工读并重”,注意培养学生的劳动精神和服务习惯。值得注意的是,私立福州协和中学的职业指导是在该校参与乡村建设实验的背景下开展的。在校长张效良的主持下,私立福州协和中学立足农村积极参与乡村建设实验。该校为了便于学生以后能参与乡村建设及改良中,“农具一方面,不绝对主张采用新巧的农具,以一般农民能购置的为标准”,“农艺的方法,也多半根据普通农民旧有的经验,再斟酌参以科学的新法,增加其效率”,使学生“不至与他们日后回到农村时的实际情景相背驰。”^②私立福州协和中学积极参与乡村建设实验还表现在,该校设有乡村广益所、乡村医药部、农村事业推广部等组织。所以,钟道赞认为,“该校设在农村中间,……种种设施,颇合乡民之希望。”^③钟道赞早年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归国后任职福建省教育厅,他在任内积极推动福建省的学校开展职业指导。除了前述的福州协和中学外,省立福州农林中学也积极开展职业指导,以便将来学生就业乡村、服务乡村。据钟道赞1933年初发表的文章介绍,福州农林中学的职业指导“由各指导员分组担任指导,各组在每星期中,指导员须与学生谈话一二次,或为谋就业之途径,或为定升学之方针,……以激其进取之心,或多方介绍职业,以遂其服务之志。”^④省立福州农林中学开展的职业指导,致力于激发学生对农林专业的兴趣、培养学生服务乡村的意愿。

一些热心乡村改良的组织在自己的实验区内也开展了职业指导。民国时期中华职业教育社曾在江浙一带选择部分农村区域探索乡村改进。江苏昆山徐公桥是中华职业教育社办理乡村改进的重要实验区,该社曾在这里进行了6年多的探索。中华职业教育社在徐公桥开展乡村改进的实验中,也规划实施了职业指导。《徐公桥农村生活改进大纲》不仅提出要在当地“散布改良种子,驱逐虫害,提倡副业”“实行卫生运动”“劝导戒除烟赌”,还提出要在当地“施行职业指导。”^⑤该社在当地开展对农民的职业指导,并将之作为民众教育的一个内容。1931年的报告显示,中华职业教育社在徐公桥开展的活动有建设、农事、教育、保安等方面,其中在教育方面所做的事情就包括职业指导^⑥。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系由江苏省立民众教育学院、江苏省立劳农学院于1930年合并而成,院址位于当时无锡城外社桥村。该院积极开展乡村改进的实验,其北夏实验区也位于无锡,其中六乡一镇为集中试办区。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北夏实验区在办理过程中,把职业指导与推广民众学校、举办农业推广、推广合作制度等事业一道纳入规划。在职业指导方面,针对“无锡各区多患人多田少,致农民多有离村者”这一事实状况,该乡村实验区试图通过职业指导,“使离村人口能得比较满意之职业。”^⑦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在乡村改进中实施职业指导有一定的基础作保障。该校开设的必修科目中就有一门《民众职业指导》的课程,并邀请对职业指导有一定研究的江问渔来讲授。这门课程的讲稿由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研究实验部的朱秉国记录整理,不仅在《教育与民众》月刊上连载,还结集出版了《民众职业指导》书籍^⑧。此外,上海职业

① 张效良:《私立福州协和中学之职业实施》,《教育与职业》总第141期,1933年1月。

② 张效良:《私立福州协和中学之职业实施》,《教育与职业》总第141期,1933年1月。

③ 钟道赞:《附言》,《教育与职业》总第141期,1933年1月。

④ 钟道赞:《福建中等学校实施职业指导之一瞥》,《教育与职业》总第141期,1933年1月。

⑤ 《徐公桥农村生活改进大纲》,转见于李宗黄著《考察江宁邹平青岛定县纪实》,正中书局(南京),1935年,第362页。

⑥ 《徐公桥乡村改进会现有事业举要(二十年二月报告)》,转见于甘豫源编《乡村民众教育》,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245页。

⑦ 孔雪雄编著:《中国今日之农村运动》,中山文化教育馆刊,1934年,第138页。

⑧ 朱秉国:《序言》,江问渔讲、朱秉国记《民众职业指导》,江苏省立教育学院,1930年。

指导所副主任潘文安也曾在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社会教育暑期学校作“农村职业指导”的演讲,呼吁在乡村开展职业指导。

值得一提的是,民国时期还曾出现过面向农村的带有职业指导性质的小说,《教育与职业》杂志刊出的《官不如农》一文,即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篇。小说叙述了张志贵、张志立两个同父异母兄弟,一个志在混迹官场,一个志在农村改良。通过两兄弟不同的职业选择及最后一成一败的结果,小说向读者揭示,在农村中只要肯动脑筋、肯付出努力也能开辟一块新天地、实现人生价值。《教育与职业》刊发的多为职业教育、职业指导方面的论文及国内外相关动态报道。小说在该刊物中较为少见。之所以会刊发《官不如农》的小说,是因为它有职业指导的意味。编辑在“编者按”中也明确指出,“悬此二途,凭人判别,实寓职业指导之意味。”^① 值得进一步注意的是,小说里面有许多弟弟张自立在地方上改进蚕桑、农场实验、兴办教育等乡村改良活动的具体描述。小说不仅具有职业指导的意味,而且具有乡村改良的意味;不仅向读者指出农村里大有可为,而且向读者揭示农村里有何可为。

相对于热心人士、社团及学校的探索而言,民国时期官方对乡村职业指导的政策反应则比较迟钝。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虽于1933年7月颁发《各省市县教育行政机关暨中小学校施行升学及职业指导办法大纲》和1935年11月颁发《各省市教育行政机关设置职业指导组暂行办法》两个关于开展职业指导的文件,但实施范围都囿于城市。至于在农村中开展职业指导,直到1945年5月17日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农民政策纲领》中才提出,要“举办农村职业指导,改良雇佣农民之待遇及生活。”^② 这已经是20世纪40年代中期的事情了。

总体来看,民国时期有不同的社会力量参与乡村职业指导的尝试和探索。从实施主体来看,其中既有学校,也有社团,甚至官方最后也表态了。从实施对象来看,有些侧重于乡村地区或农业学校中的学生,有些则侧重于乡村实验区里的农民。从实施内容上来看,有些侧重于乡村敬业、创业精神的培养,有些则侧重于乡村中择业、就业建议的提供。尽管当时他们面向乡村职业指导的对象、内容侧重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救济改良中国乡村、促进中国乡村发展。

三、职业指导切入乡村救济改良的视角及意义

民国时期在乡村救济与改良领域论及“职业”一词的,并非只有职业指导的提倡者。梁漱溟在谈乡村建设时也曾论及“职业”一词,但他更多地旨在论述中国社会的性质及与西方社会的区别。他认为中国社会是一个“职业分立”的社会,而非西方“阶级对立”的社会。他说:中国社会“各人作各人的工,各人吃各人的饭,只有一行一行不同的职业,而没有两面对立的阶级。所以中国社会可称为一种职业分立的社会。”^③ 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在于“文化失调”。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建立政教合一的乡农学校,推行“新乡约”,实施乡村自卫,同时举办农村合作、改进农业技术。梁漱溟解决方案的重点并不在于农民职业问题的本身,而是恢复乡村固有文化伦理、重建乡村秩序。而晏阳初在定县平民教育实验中也有类似“职业”问题的论述。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村的症结在于“愚、贫、弱、私”,提倡以文艺教育救愚、以生计教育救贫、以卫生教育救弱、以公民教育救私,并在定县的平民教育运动中加以实

① 贼菌:《官不如农》,《教育与职业》总第95期,1928年5月。

② 《农民政策纲领》(1945年5月17日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荣孟源主编、孙彩霞编辑《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928页。

③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71页。

施。晏阳初指出“即需有生计教育,使人人备具生产的技能,造成能自立的国民。”^①他所提倡的“生计教育”,类似于可以谋生的职业技能培养。时任职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实验办事处生计教育部的王达三曾呼吁:“县单位农村职业补习教育之推行,实地工作人等,应责成县督学及农事技士办理”,“农事技士在技术上及职业训练上应多所擘划”,应“划区办理”,“区之各村组成职业补习班”^②。晏阳初及其群体所提倡的,有些类似于职业教育或职业补习教育。当然,民国时期也有人专门提倡过农村职业教育,创办过一些农业职业学校。有学者曾指出:“今后当局,除应注意农村义教普及外,更当确立‘农村职业教育’为农村教育之中心,盖此种教育之实施,即所以满足农民之需要,于智识上,使其能了解农业社会之意义,而改善其环境”,“于技术上,使其能利用科学,改进技能,以从事于主副各业,……以增高其生产率。”^③中华职业教育社等组织也曾经在乡村建设实验中开展过职业教育,培训农民的职业技能。国民政府教育部于1937年2月颁布的《各省市推行职业补习教育办法大纲》中也曾规定:“农业职业学校及乡村师范学校,应办理农艺、畜牧、合作等科。”^④

然而,民国时期职业指导在切入乡村救济改良时却有着不一样的地方。职业指导从“职业”视角切入乡村救济改良,注重的是乡村择业、就业、创业以及敬业等职业问题的解决,它要培养服务乡村的敬业精神,为农村吸引或留住人才;它要指导青少年在乡村根据自身特长和地方需要,正确地择业、就业、创业;它要启迪人们开发农副产业、创业乡村的意愿;它要开展农村职业调查,拓展农民的择业视野;它要改变乡村落后的职业观念,革除乡村职业陋习,等等。所以,民国时期面向乡村的职业指导,已不仅只是把“职业”作为分析中国社会的依据,而是聚焦乡村择业、就业、创业以及敬业等职业问题解决的本身。并且,职业指导与单纯的农村职业教育也有所不同^⑤。民国时期提倡的农村职业教育或农村职业补习教育,其核心在于强调农村职业技能的掌握;而职业指导则注重职业兴趣、职业意识、职业观念的培养,择业、就业、创业的恰当性,以及是否具有服务农村的敬业精神。

民国时期面向乡村的职业指导,至少在培养服务乡村的敬业精神、开拓农村青少年择业视野、激励人们在乡村创业、改良乡村陈旧职业观念等方面,具有积极的作用。

面向乡村的职业指导,重视让受指导者形成服务农村的敬业精神。潘文安曾指出:“讲到职业指导,并不是指导村民或农民子弟,抛弃他们的本业,大家到都市里去,另谋职业的意思,乃是指导他们在本位上的发展。”^⑥蓝渭滨也指出:“若使农民尽慕都市职业有利,大都出村即入都市工作,则农村缺乏劳动者,农村必益破产。”^⑦“职业指导开端于小学时期之职业陶冶”^⑧。曾担任昆山地方自治实验区唐家角陆景乡村小学校长、余姚诸家桥乡村试验小学校校长的茅志岳,提倡在农村小学开展职业陶冶,以培养农村小学生对于农业的职业兴趣,指出农村小学校中各种科目要“引起学生爱重园圃的兴趣,看重农事的观念”,“作实地观察,以正确学生的智识,以引起学生农作物的兴味”,如国语科“应读著名农业家的小传轶事”,算术科“计算农作物的价值”,其他如开展“农事讲演”,“遇有机会,请农业专

① 晏阳初:《平民教育概论》,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刊,1928年,第10-11页。

② 王达三:《农村职业补习教育之推行》,《教育与职业》总第187/188期合刊,1937年10月。

③ 李骥:《农村职业教育之商讨》,《农村经济》1934年第1卷第12期。

④ 教育部编:《教育法令汇编》第3辑,正中书局(重庆),1938年,第48页。

⑤ 当然从民国到现在,也有人把职业指导归入广义的职业教育范畴,认为职业指导是一种教育性活动,但职业指导与单纯的职业学校教育及职业技能培训还是有较大区别的。

⑥ 潘文安:《职业指导ABC》,ABC丛书社(上海),1931年,第57页。

⑦ 蓝渭滨:《农村社会事业之理论与实施》,农村经济月刊社编《农民阵线》,编者刊1934年,第35页。

⑧ 邹韬奋:《初级中学就注重职业指导》,韬奋基金会、上海韬奋纪念馆编《韬奋全集》(增补本1),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11页。

家或讲述农业上重要及乡村生活的趣味等。”^①毕业于大夏大学的黄春考认为,职业指导应“使人人具有爱护农村之热忱,并能谋本位之向上”,“使农业及其他副业,皆得逐渐改进。”^②福州农林中学在开展职业指导的过程中,也注意激发和培养学生服务农村的兴趣和意愿。相关活动情况已见前述。当然,在实际推进过程中,面向乡村职业指导的提倡者也会注意因地制宜,如前述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北夏实验区就根据无锡乡村人多地少的情况,曾为离村农民提供进入城市谋业的职业指导。但多数乡村职业指导的提倡者,还是更注重培养青少年服务农村的敬业精神。乡村的复兴,离不开人才。民国时期乡村职业指导的这种倾向,从根本上说,还是反映了提倡者们试图通过职业指导吸引或留住一部分人才,来推动乡村建设、推动农村复兴的愿望。这种职业指导在有些地方也收到了一定成效。以福州农林中学为例,据钟道赞 1933 年初发表的文章介绍,该校开展职业指导后当年应届毕业生学生,“除三四人志愿升学外,余均志在乡村工作。”^③结合该校前一年未就业而升学者均考入了农学院的情况来看,省立福州农林中学的职业指导在推动学生立足本专业、学用结合以及志愿服务乡村等方面成效明显。

面向乡村的职业指导,注意开阔农村青少年择业视野、激励人们在乡村创业。民国时期陈礼江、潘文安等人都主张职业指导应注意调查。陈礼江认为乡村职业指导最重要的工作有两样,一是调查,二是指导。他所说的调查主要是指对受指导者个性、兴趣、特长的调查^④。与陈礼江不同,潘文安虽然也主张在乡村职业指导中注意受指导者个性的调查,但更强调农村的职业调查。潘文安曾指出:“实施农村职业指导,应根据社会事实。所以第一步须从农村职业调查入手。”^⑤对各地农村现时职业种类的调查,不仅可以为实施乡村职业指导提供依据,更可以改变农民及一般社会人士的思维定势,以免想当然地认为农村只有耕作一种工作。这样,可以扩大农村青少年的择业视野,也可以树立在农村服务的信心。

部分乡村职业指导提倡者还认为,不仅要让农村青少年知道当地农村现有的、已有的职业,也应该让其了解当地农村应该有的、待发展的职业。前者的了解,帮助他们在农村择业;后者的了解,则推动他们在农村创业。潘文安就曾指出农村中应有的职业以及青年需要关注的职业。他认为农村中应该有的职业 36 种,包括兽医、测量员、教师、医生、助产人、农具制造、棉织业、土木工程、家具工业、药业、木业、竹业、豆米业、果树业、牛乳业、畜牧业(包含养鱼、养蜂)、蚕桑业、糖果业、酿造业、饮食业、砖瓦业、磨坊业、理发业、缝纫业、书业、贩卖业、转运业等^⑥。潘文安还认为,“今后农村的重要职业,应积极提倡督促青年注意”的有:

1. 属于建设事业的——土木工业、机械工业、电气工业、森林业、交通事业。
2. 属于生产农业的——园艺业、蔬菜业、种植业(包含稻作、麦作、棉豆瓜果等)、种桑业、种竹业。
3. 属于畜牧事业的——养牛、养猪羊、养鸡鸭、养蜂、养鸽、养鱼、养蚕、养兔、牛乳业。
4. 属于制造工业的——丝织业、棉织业、毛织业、制造农具业、制造家具业、酿酒业、糖果业、砖瓦业、碾米榨油、面粉业、冷藏业。

① 茅志岳:《乡村小学的农事陶冶》,《教育与职业》总第 95 期,1928 年 5 月。

② 黄春考:《农村教育与职业指导》,大夏大学教育学院同学会编辑委员会编《教育建设》第 2 集,编者刊,年份不详,第 90 页。

③ 钟道赞:《福建中等学校实施职业指导之一瞥》,《教育与职业》总第 141 期,1933 年 1 月。

④ 陈礼江编著:《简易师范学校乡村教育及民众教育》(建国教科书),正中书局(重庆),1938 年,第 74-76 页。

⑤ 潘文安讲、茅仲英记:《农村职业指导》,《教育与职业》第 118 期,1930 年 10 月。

⑥ 潘文安讲、茅仲英记:《农村职业指导》,《教育与职业》第 118 期,1930 年 10 月。

5. 关于合作事业的——信用合作、生产合作、消费合作、农具合作、种子合作、肥料合作。

6. 关于间接生产事业的——医生、教员、图书馆管理员、新闻记者、兽医。^①

按照潘文安的看法,当时中国的乡村哪里是前景黯淡,反而是大有可为,创业空间巨大!这样一种职业指导,是要告诉青年不要在农村原有的行业或职业上将就,而是应该根据农村所需努力创业。

面向乡村的职业指导,有人还提出通过职业指导改变农民的职业陋习。茅志岳曾提出,针对农民中“越界侵占邻田”,“对于捕虫除害等事,每不齐心”,“以于开河筑堤等事,往往不能协力同心”等事,要从小抓起,在小学中就开展相关的职业陶冶和指导,以形成正确的职业观念^②。这样的一种职业指导,有助于改变农民职业陋习,培养农民良好职业习惯、确立良好的职业规范,客观上推动农民的现代化,促进现代农民的形成。

需要承认的是,整体而言民国时期职业指导在农村中还处于尝试和探索的状态。职业指导只是在前述部分农村地区得到了实施。即使是当时进行乡村改良救济实验的地区,也并未都实施过职业指导。受条件所限,职业指导在农村中开展的范围还相对有限。在各地农村发展程度不一、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整体不高的民国时期,提倡农村职业指导,在外界有些人看来,多少带有一些理想主义色彩。与当时其他乡村救济改良措施一样,职业指导也面临着多大程度上能改变中国农村的拷问。职业指导重在改变思想观念,面向农村职业指导的效果,有些可以得到印证,如福州农林中学毕业生的择业结果;更多的则囿于统计的不足、观念改变的监测难度,缺乏印证的结果或难以印证。不过,这并不能否认职业指导可以从专业化视角解决农村职业问题,在增进农村职业兴趣、开阔择业范围、激发创业意识、革除职业陋习等方面的客观作用;也不能否认职业指导立足科学转变人们传统职业观念,对于中国农村现代化进程的特别意义。

从长远来看,民国时期面向农村职业指导的一些设想及计划仍有其可取之处,对于后世直至今天也有着一定的启发意义。具体的救济改良措施,是针对具体的社会问题,不能苛求它非要在根本上改变社会。职业指导可以和其他一些措施相互配合,利用自己所长,共同致力于中国农村问题的解决。这样看来,在民国时期农村问题解决过程中,革命固然必要,但改良在某些具体方面的作用也是不能忽视的。

[参 考 文 献]

- [1] 王安平. 卢作孚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述论[J]. 社会科学研究, 1997, (5).
- [2] 宋恩荣, 熊贤君. 晏阳初教育思想研究[M].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4 年.
- [3] 朱汉国. 梁漱溟乡村建设研究[M]. 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6.
- [4] 郑大华. 民国乡村建设运动[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
- [5] 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 梁漱溟全集(第 2 卷)[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5.
- [6] 费孝通. 江村经济(修订本)[M]. 上海: 世纪出版集团, 2013.
- [7] 宋恩荣. 晏阳初全集(第 2 卷)[M]. 天津: 天津教育出版社, 2013.
- [8] 蒋宝麟. 体国经世: 民国的学人与商人[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5.

① 潘文安讲、茅仲英记:《农村职业指导》,《教育与职业》第 118 期,1930 年 10 月。

② 茅志岳:《乡村小学农事陶冶》,《教育与职业》第 95 期,1928 年 5 月。